

女真——滿族建國研究

モルムのモルムアラのトモロコトモア

肅慎

靺鞨

沈阳

赫图阿拉

女女女真

庚

女真——满族建国研究

王冬芳 著
季明明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真——满族建国研究/王冬芳, 季明明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77 - 3374 - 7

I. 女… II. ①王…②季… III. 女真—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174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自序

清史自 20 世纪初以来逐渐成为显学，造就了国内外众多的知名学者、大家，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了这个领域，并且选择了入关前史这个对我来说有地利之便的主攻方向。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关于清人关以前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将清史研究推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潮。那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努尔哈赤、皇太极带领满族崛起是偶然的吗？如果换了别人是否也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在研究努尔哈赤、皇太极的过程中感到，他们个人才干的发挥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基础上的，就是说英雄造时世是在时世造英雄的前提下。例如，努尔哈赤起兵和统一女真人，是在社会混乱到了极点，“当争夺之时如熊虎互相嗤播，偷盗如豺狼遍野”，特别需要改变这种社会状态，“将有圣人出以戡乱”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而造成如此状态的社会必须是私有制得到空前发展，私有制膨胀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改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皇太极建立大清国是一大历史贡献，然而是在女真统一与集中的状态下实现的。那么是怎样的社会状态为努尔哈赤父子提供了历史舞台？潜在的疑问使我时时留心相关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有机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专家吕光天先生进行较长时间的交流。他侃侃而谈几十年来在民族史研究领域的艰难爬梳，及从民族史的足跡中寻觅人类历史的点点收获。大学者的谈话给了我启示：民族史也是人类史的组成部分，是互相可以借鉴的。

《李朝实录》记载了明代女真社会的许多事情，较比《明实录》的相关记载具体详细，特别是经过日本学者们的摘抄，阅读更方便，于是在完成正常科研课题的同时，我开始了阅读《李朝实录》和《明实录》的工程，一面读书一面做摘抄，将两部大书通读两遍。这样脑子里对明代女真社会有了一个系统轮廓，以后继续收集明朝、李朝官私史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脑子里的这个系统轮廓。史料很重要，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依据，而理论也很重要，史学理论也是史学界在不断探讨的问题。在广泛阅读理论著作的同时重点思考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社会性质”、“奴隶”、“文明”、“国家”、“生产力”、“经济形态”、“权威”等，也同样经历了思想成熟的过程。在阅读和耙梳的过程中一晃过去了 20 余年。我开

始分专题撰写篇章。

其实本书早该面世，1995年单位领导调我到“辽宁社会科学志办公室”，主持修志工作。8年的艰苦奋斗完成了《辽宁社会科学志：1840——1985》主卷；《辽宁社会科学成果总目：1840——1985》副卷的编撰工作（均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和2003年出版）。两书完成以后我退休了，亲人们都期盼我能从此好好休息了。我看着多年积累下来的堆得高高厚厚的资料、卡片，这是多少年的物化劳动，还有积累在心中的认识，大有不吐不快之感。我还是说服了亲人们支持我完成这部书稿。

为了把思路重新提升上来，我再次通读《清实录》、《明实录》、《李朝实录》及有关资料。这部书稿从2005年1月动笔到2006年8月底一气完成初稿。置稿10个月，又用3个月修改初稿。2008年3月又对书稿进行压缩处理。

书稿完成的这一年正是我的母亲张淑芬女士诞辰八十二周年，就以本书作为纪念吧。母亲生养了我们姊妹四人，她一直与“一切听从党安排”的父亲两地生活。她勤劳节俭而且教子有方，因此而被所有认识她的人夸赞。她那永不停息的奋斗，时时让我感受着她的旺盛的生命力，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她也会有倒下的那一天。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忍耐、勤俭，又有近代以来女性对新事物的敏感和热情。

外子季庆复先生是学工科的，数十年来对我的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时常使我感动。他有时直接参加到我的工作中来，帮助查阅资料等，更多的是多做家务，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撰写本书。季明明是我的女儿，她是学管理学的，长期以来的耳濡目染使她对我的工作不但关心而且感兴趣，并且参加到工作中来。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王思治先生、赵展先生、周远廉先生、刘晓萌先生的帮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学苑出版社孟白社长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冬芳
于沈阳补拙斋

2008/6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女真人应招、朝贡、求市：社会飞跃发展的起点	(8)
第一节 招抚女真与卫所制度的建立	(8)
第二节 贡赏与马市制度的形成	(16)
第三节 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策略的形成	(22)
第二章 建州人的迁徙：向汉文化靠拢	(32)
第一节 建州左卫初址是镜城不是会宁	(32)
第二节 建州左卫的艰难建立	(51)
第三节 猛哥帖木儿被迫的选择——迁徙	(68)
第四节 李满住、凡察、董山无奈的选择——迁徙	(86)
第五节 努尔哈赤进攻的选择——迁徙	(129)
第六节 建州人迁徙踪迹追索	(131)
第三章 女真人与明朝的不断矛盾与冲突：文化差异与歧视带来的 麻烦与痛苦	(143)
第一节 杨木答兀考察招抚的诚意	(144)
第二节 李满住、凡察、董山与明朝亲仇相见原委	(156)
第三节 李满住等的子孙“叛服无常”原因追索	(188)
第四节 “以夷治夷”与“强者为霸”的冲突	(196)
第五节 王杲与王兀堂的叛逆	(207)

第四章 以铁与牛为核心的工具革命:生产力的提高	(212)
第一节 技术来源与普遍提高	(212)
第二节 传统工具	(217)
第三节 对铁的迫切追求	(223)
第四节 依赖型铁业的发展	(231)
第五节 对牛的追求和大量使用	(238)
第六节 建筑技术的进步与城	(243)
第五章 从采渔猎到农商战:生产方式的改变	(264)
第一节 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活:喝粥、吃肉、穿皮	(264)
第二节 朝贡、马市促成了女真社会的商业经济	(275)
第三节 依赖型农业的发展	(294)
第四节 战争升级与征战的职业化	(319)
第六章 从血缘纽带到等级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	(337)
第一节 原初的社会组织结构	(337)
第二节 家庭形态与演变	(348)
第三节 社会大分工的逐渐实现	(366)
第四节 在利益竞争中血缘纽带越来越松弛	(374)
第五节 财富在家庭的积累推动了社会等级的形成	(390)
第六节 联姻与同盟的逐渐扩大	(417)
第七节 乌拉部——忽刺温地缘集团的形成	(426)
第七章 建州女真最高首领的传承:公共权力从家族内竞争到 社会选择	(436)
第一节 努尔哈赤的家族世系	(436)
第二节 成化以前各部大首领的世系	(444)
第三节 成化以后三卫大首领的世系传承	(449)
第四节 嘉靖以后各部大首领	(454)
第五节 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子嗣任最高官世系表	(457)

第六节 建州三卫的姓	(461)
第八章 权威制度的成长:公共权力性质的改变	(464)
第一节 原初的民主形态	(464)
第二节 羁縻政策培育了权威制度的成长	(471)
第三节 酋长权威在财富积累中成长	(484)
第四节 从大箭主到酋长的英雄崇拜	(487)
第五节 战争树立起汗王大纛	(491)
第九章 清帝国的建立:迈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	(498)
第一节 激烈兼并的战国状态	(499)
第二节 攻取辽东、走出大山	(511)
第三节 后金国 满洲族与清帝国	(521)
第四节 六部设立与启心郎官制	(528)
第五节 法律 税收与八旗军队	(534)
第六节 中央集权制的形成	(546)
第七节 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560)
第十章 文化的飞跃进步: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	(573)
第一节 承接汉文化	(573)
第二节 汉人以不同方式传播汉文化	(584)
第三节 观念习俗的等级化	(591)
参考书目	(600)
书中依据的主要史料	(600)
书中引用的主要著作、论文	(602)

绪 论

一、关于国家的概念

国家,对个人来说是母亲,对民族来说是依托,对于人类,则标志着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家很重要,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的强大与发达是个人富裕与民族进步的保证。所以,每个人都关注国家,关注自己的国家,也关注别的国家。国家是人类关注的焦点。

学术界也非常关注国家,学科领域不同关注点各有不同。因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历史学界非常关注它的起点。它是如何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什么?诞生的意义是什么?动力原因在哪里?国家与文明有着怎样的联系?诸多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探讨,也需要史实的佐证或修正,史实是过去的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书从史实出发,研究女真——满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上述问题是不可逾越、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先在这里就相关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

1. 国家形成的标志

在悠长的人类历史中,国家的出现很晚,以历史悠久的中国为例不超过5000年,对比有250多万人类史来说是短暂的。英国当代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引用一位法国学者的说法:7万年以内是人类的近代史。他这样说的根据是技术革命的速度加快。“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年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①在这一时间段内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步,又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伟大的技术革命奠定了一个更伟大时代到来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他也借意大利哲学

^① [英]汤恩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页、第25页

家的说法,称 5000 年以内应该是人类的当代史,因为这一段历史是有文字可考的。^① 有文字可考的这段历史是人类的文明史,它的标志就是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国家形成以什么为标志呢? 学术界一直将“地缘组织”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及金属器的使用等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学术界一直遵循着这个理论在史料中耙梳,使一些问题的探讨在一些民族史领域进入了误区。例如,对明代女真社会的探讨,称女真人的村寨是“地缘组织”。其实对于不断迁徙的明代女真人来说,“地缘”实在不重要,早期的村寨不是地缘组织,而是血缘聚落;如果把文字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那么在满文之前就有女真文,也是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文字,明朝建立“四夷馆”,有专门负责翻译女真文的官员,授给女真首领的敕书、圣旨都是用女真文写的。如果说当时女真文的普及率极低,因此不算作有文字存在的话,那么后创立的满文也不是满族成员的必修课,满文只掌握在少数满族文臣手中。这一切说明过去遵循的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论应当重新思考,因为那些标志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需要找到世界各国国家出现时都有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大门也向世界敞开,有了与各国同仁交流的机会和条件,这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李学勤等学者对国家形成的标志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主张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阶级、阶层或等级之类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系统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构的本质特征。”^②

对此他们解释说:“但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其中,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③ “考古发现表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国家都是先于成系统的文字记载而出现的……”^④ “所以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其可操作性是

^① [英]汤恩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0 页、第 25 页

^②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 页

^③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 页、第 2—3 页

^④ 王震中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 页

不言而喻的。然而，事物往往都是二律背反，愈是具体的东西，愈具有它的局限性。上述文明观就明显地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这类‘标志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其二是它将文明看成是单项因素的凑合，形成所谓‘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这既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更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做出应有的解释。”^①因为过去的理论不能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被修正。

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的一大进步，这也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国家形成理论中将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作为历史前提意味着什么？个体家庭在母系社会就出现了，但是只有当财富在家庭中大量积累，才使家庭的力量超过了氏族的约束，家庭和财富的结合造成与从前不一样的社会状态。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松弛了，氏族失掉了统御社会的功能，各个家庭之间的能量差距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财富实力差别越来越大，必然产生阶层、阶级，社会组织结构必然发生变革，国家是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最高代表。

2. 国家产生的原因

与国家产生原因关系密切的是国家的本质问题。列宁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②编撰《辞海哲学分册》的学者们对这段话做了解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③列宁的这段话针对那个时期，是对的，而在今天明显不适用了。今天被专政的是搞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和健康的坏分子，他们是个人现象，不是阶级现象。

对于国家产生的原因，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④《辞海》也这样说：“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他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时产生……”^⑤这一解释并不是编辑们的个人意见，是时代的观念。如今那个时代过去了，时代留下的观念需要重新思考。

笔者在研究女真——满族历史中，没有看到后金国和清帝国的建立是由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促成的，倒是看到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分裂状态，和强强之间

^①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第2—3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修订：《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⑤ 《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不能停止的激烈的竞争与冲突的史实。“时诸国纷乱，……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占。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社会处在无序状态中，那个时代呼唤能够勘定诸乱的能人，社会需要安定有序。“先是望气者言，满洲将有圣人出，勘定众乱，统一诸国，而履帝位。”^①

彼时已经出现了阶级，被剥削阶级是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庄丁和家仆，但是他们的反抗仅是逃亡的个别行为，最多是为对抗集团提供信息，成为帮凶而已，不能完全由这些人结成社会力量与贵族阶级进行对抗，他们不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动力。倒是贵族层面的殊死争夺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点，而且努尔哈赤父子建立国家的意图和措施，在于防止再次分裂，即防止强者之间竞争不已的局面再次出现。他们努力的结果是社会逐渐进入了有序状态。“今则王子统帅诸胡，号令进退，岂有违越之理。”“胡人等言，在前则胡人之凡有出入者，必配持弓箭，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自王子管束之后，远近行走，只持马鞭。王子威德，无所拟议。”^②

以此观之，女真——满族国家的产生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各大酋长们的争夺拼杀，国家的产生是社会需要统一、安定和有序，需要进一步发展促成的。由此可以认定国家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定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的功能和本质也不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以今天观之，国家拥有对社会的维护秩序、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灾害的防控补救、对国土安全的保卫、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等职能。总之，国家是社会有序发展的保障。

笔者以对历史的考察和对现实的观察，认为：国家的本质亦即国家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和的矛盾、冲突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控制社会，这样社会才能继续发展。这个权威机构就是国家，国家是这样产生的，也具有这样的职能，体现着这样的本质。

恩格斯对国家形成的原因和实质做了合乎史实的解释，他说：“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实现’，‘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台湾华文书局

^②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辽宁大学历史系印制，1979年

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我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没有专指阶级,如同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社会,其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是住在坚固城堡里的拥有部众的各位大酋长们,是他们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且不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就不会结束那种社会分裂、争斗不已的状态,如果那样凶残地继续斗争下去,不断地消耗社会能量,只能导致社会的倒退。应该承认国家的产生拯救了混乱不堪的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新的进步发展的起点。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超然的力量。这是国家的实质,也是国家产生的原因。

3. 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

因为国家的出现如此重要,所以备受人们重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称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到来。恩格斯与马克思都赞赏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也将国家建立作为迈进文明门槛的标志。因之,国家是文明的开端,文明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王震中说:“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合理命题,国家的出现,就是史前社会的彻底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②

中国史学界关于国家就是人类文明起点的观点来源于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写道:“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恩格斯与摩尔根所划定的三个时代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分期,并且将文明一词加在第三个时代的前面。并且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代表性的“杰作”,如该书中写道:“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③ 恩格斯和摩尔根站在近代社会的视角,对上古及以前的历史时期做一个历史进程上的评估和概括,所以那样定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明到来的这个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腾飞的起点,自从那个时期以后直到今天,人们都生活在更能激发创造力的管理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页

②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第21页

有序的国家里，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即享受着国家形态的社会文明。

李学勤等学者说：“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文明史的研究中，许多卓越的社会科学家都是将文明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无庸讳言，人类由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适应各自区域地理环境下全方位的演进，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的智力、思维能力、思维方式以及宇宙观等）；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语言、文字、生产工具、武器、衣、食、住、行等）；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在这一系列的演进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表现为社会形态上的运动与推移。在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

王震中说：“由于各古代文明所处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文明到来时的现象即文明的要素及其表现形态自然也就不尽一致，它体现了文明社会演进格局的多样性。既然用具体的文化形式难以对各地文明社会做出共同标志的概括，那么能否在这些具体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确立一个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而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笔者的回答是肯定。全面考察史前与文明社会的形态区别，笔者以为能担当此任者只能是‘国家’。”^②

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对国家的出现非常重视，认为它是文明社会的起点，而且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体现文明社会的内涵，足见国家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里有一个疑问：恩格斯为什么认为国家形成之前的杜会是野蛮的呢。母系社会也是一个人类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管理有序和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也给人类带来文明的享受。我认为恩格斯所肯定的史前两个阶段的分期法是正确的，并不是对母系社会的否定，而是从大视角上对各阶段的评估和概括。人类从降生时开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蒙昧，即汤恩比称的人类意识上的蛰伏期，然后进入发展阶段。同为发展阶段的野蛮与文明两个时期，不过是发展速度相差很大，为此冠以野蛮和文明两个词以示区别，不能将这两个词视为褒或贬之意，更不能将两个词所标示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按照词义进行表面理解和绝对化。

①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②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二、关于女真——满族建国问题

女真——满族建国对满族来说是历史性的大事，首先他们的国家，不论是后金这个雏形国家，还是清帝国这个真正意义的国家，都不是明朝给予的，是女真——满族自己创造的。

但是，女真——满族为什么在明朝以前漫长的岁月没有迈进国家的门槛？这个问题上与明朝有密切联系。因为明朝自建立之初对女真人实施了羁縻政策，正是这个羁縻政策给女真社会带来了历史飞跃的契机，当然这不是明朝制定这个政策的初衷。

羁縻政策像催化剂一样，自实施开始就在女真社会发生了作用，促成其社会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首先，使女真人看到另一种文化带来的富裕和幸福，使女真人大开眼界，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其次，女真人找到了他们眼中很一般的山林之物的销路和市场，这是家庭立刻富裕的途径，家庭富裕是历史进步的社会基础。再次，女真人得到了铁器、耕牛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又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获得辽东军民这个农业生产力，使生产方式发生改变，这是历史进步的经济基础。又次，通过明朝授官赏赐使首领们的权威日益增长，促成上层建筑的形成。总之，羁縻政策的长时间实施，促进了女真社会内部接连的改变和演变，直至发展到国家的建立，其历史文化逐步发展到与明朝等同的程度。

本书从明朝对女真实施羁縻政策开始，层层递进地探索女真社会的变化和演进，展现出一个民族迈进国家门槛的历史过程。

第一章

女真人应招、朝贡、求市：社会飞跃发展的起点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对蒙古与女真人实施安抚政策，以相安无事为宗旨。他的具体办法是首先招抚，其次是武力征服。洪武四年（1371）元平章刘益献辽东归降明朝。但是以纳哈出为首的蒙元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不仅占领大片疆土而且兵锋直逼辽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辽阳。朱元璋被迫将主要精力用于平定纳哈出等反明势力，然后又进行招抚。

明成祖朱棣即帝位以后迁都北京，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又浙江等九省富民充实北京，兴土木建宫殿，从此北京成为明朝的中心。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对东北的政策，对女真人进行招抚。明代女真卫所大部分始设于永乐年间，并且奠定了贡赏赐廉政策制度的基础。他的政策得到女真人的热烈响应。

朱元璋以武力平定东北，朱棣以文治兴东北，他们开辟了明代东北的新纪元。有明一代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实现了民族崛起，古老的女真民族为什么在明朝崛起？关键在于明朝实行了一系列促其崛起的政策和策略，外因推动了女真社会内部的变化，使他们加快走出传统的脚步，走到了与汉人兄弟文化与文明比肩的程度，共同创建了大清王朝。

第一节 招抚女真与卫所制度的建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创者，他的内外政策都来自其思想与观念。他对待民族问题的定位是华与夷有别，华的代表就是他，他继承了汉唐的道统；夷就是包括蒙古、女真人在内的周边民族。华与夷虽然有别但不对立是他安边思想的基础。

比如对北徙的蒙元势力不是灭绝政策，在他给元主的信中这样说：过去你的祖宗拥有中国，到你即位以后形势变了，你不能驾驭形势而逊位退到沙漠。而我有能力追杀你，可我不忍。我为你考虑：“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①这样相安共存的思想奠

^① 《明太祖实录》卷3 壬子条

定了明朝对各民族招抚政策、策略的基础。

一、洪武年间对东北的招抚

如何治理东北？明朝考虑到东北与内地不同的地理民俗，没有实行州县之制，而是实行了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从招抚开始，招抚从明朝初年开始。洪武三年九月，朱元璋派断事官黄侍赴辽阳等处进行招抚，劝故元老臣来降：“……海外诸国皆称臣入贡，是盖知天命之有归，顺人事之当然者也。岂汝之智反不及耶；抑我师之未加，姑以为可自安耶？兹特遣人往喻，能审知天道，率众来归，官加擢用，民复旧业，朕不食言，尔其图之。”转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人带着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来献。朱元璋降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刘益为指挥同知。这是明朝对东北地区进行招抚的开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又“命俺得迷失等往辽东、海西等处招抚夷民，各赐衣物”^①。

洪武二十二年，剿灭纳哈出的势力以后，设立了兀良哈三卫，其具体位置：依照傅朗云、杨旸的说法：设福余卫于今之齐齐哈尔附近；设泰宁卫于今吉林省洮南附近；设朵彥卫在今索伦西南的朵彥山附近^②。永乐初年兀良哈三卫迁到今赤峰、朝阳等地是后话。当时因为其势力最大影响最大，明朝招抚成功的影响更大。

明朝在对蒙元势力进行招抚的同时，对女真人也进行了招抚。洪武十五年二月，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来归^③。这肯定不是女真人接受招抚的开始，因为他们是距辽阳“三千四百里”远的“佛出浑”地方以外的人，这样远的女真首领都来了，近处的人呢，自然会就近先登。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一年六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报，“新附降胡一百六口”，如果“降胡”不是指女真人的话，那么洪武十四年十一月“故元遗民六十九人自纳儿崖来归于女真千户所”，这“女真千户所”的建立可是女真人归附的明证了。

女真人不仅来投归明朝，而且愿意为明朝继续做招抚工作。速哥帖木儿等

① 《明太祖实录》卷 56 乙卯条，卷 190 壬辰条

② 《明代东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载《求是学刊》，1981 年第 2 期

③ 《明太祖实录》卷 142 壬戌条